

杜國庠學思研究



封面题字：吴南生

责任编辑：卢权 曾宪志

封面设计：容璞

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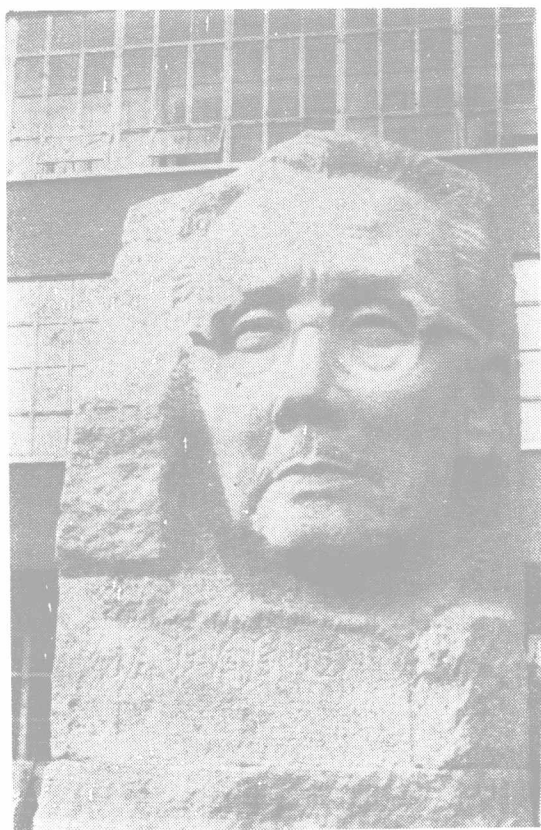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0427-x/K·95

*

定价3.50元



杜国庠同志塑像

序

吴南生

《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一书是全国学术界今年四月在汕头大学举行“杜国庠同志学术思想研讨会”的成果。

杜老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整理和研究中国思想史卓有成绩的著名学者之一，是我们敬爱的有学问的长辈。他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学说的熏陶，一九一九年毕业回国，致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毕生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和从事学术研究，成为中外知名的学者。

杜老研究中国思想史，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而以先秦时代为重点。他关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的学术著作，包括自孔子到韩非子，即春秋末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的主要代表者。他以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渊博的学识，必备的古文学修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既着力于还诸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又精心探索诸子思想发展的规律，从而作出“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与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种斩不断的葛藤”这样无比精确的论断。这可以认为是杜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先秦诸子

思想的集中体现。

杜老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他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上的学术成就，不但在他的时代是卓越的，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是具有开拓性的。杜老自己谦称他只架设了一道“便桥”，其实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尽管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从事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屈指可数，但令我们欣慰的是为这次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就有三十多篇，数量相当可观，内容各具灼见。这次召开的难得的学术研讨会，对杜老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是一次学术上的盛举。尤其可贵的是杜老生前朋辈与追随者为杜老诞辰100周年所撰写的数十篇回忆录，从各个侧面记录杜老生平行状，更是研究杜老学术思想的难得资料。本书编者从中精选了20余篇，加上《杜国庠传略》，以供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者们的参考。

是为序。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 录

序.....	吴南生 (1)
杜国庠先秦子学体系的建构及其辩证方法.....	李辛生 (1)
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概论.....	杨越 蒋祖缘 (15)
略论杜国庠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张江明 章权才 (26)
杜国庠先秦诸子研究及其方法论特点.....	卢钟铎 (37)
杜国庠先生关于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研究.....	章 沛 (55)
杜国庠与中国经学史研究.....	章权才 (67)
《论“理学”的终结》一文中的历史比较方法.....	关履权 (85)
杜国庠的墨子论及其学术风格.....	吴熙钊 (93)
试谈杜国庠研究哲学史人物的方法论	李瑞华 (107)
杜国庠关于庄子的评价	杜宇民 (115)
读《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的体会	黄家森 (122)
杜国庠对范缜《神灭论》的研究	杨振贤 (128)
辟“经虚涉旷” 倡“实事求是”	韦感恩 (138)
——杜国庠对明清之交“经世致用”思想的研究与传播	
文艺大众化的先声	熊泽初 (152)
——读杜国庠《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	
遗泽永在 风范常存.....	林洪 曾牧野 张难生 张 磊 (157)
——纪念杜国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墨者·学者·革命者	李锦全 (167)
——谈杜老的为人与治学	
哲人不萎	杨应彬 (177)
——纪念杜国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杜国庠论百家争鸣及四十年代的一场论争	李公天 (181)
论杜国庠与河上肇	姜伯勤 (193)
怀念杜国庠同志	蔡尚思 (202)
杜国庠诞生一百周年	秦牧 (206)
——怀念一位卓越的学人和忠厚的长者	
忆往	石啸冲 (213)
——纪念杜国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蔼然长者 学术宗师	李稚甫 (219)
——回忆在杜国庠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忆杜国庠同志	邱汉生 (226)
杜国庠传略	熊泽初 黄学盛 (235)
编后	杨越 (268)

杜国庠先秦子学体系的建构 及其辩证方法

李辛生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杜国庠同志，从一九一六年与李大钊同志组社反袁，到民主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在他毕生的革命征途中，始终坚持不懈地结合革命实践，进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探索。对在我国哲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在先秦诸子研究中，由于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揭示先秦诸子的内在矛盾及其思想源流和脉络，已自成体系，卓著特色，在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老的子学著作较早的已越半个世纪了，较后的也近二、三十年了，但在开拓子学体系中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仍不断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因此，如何探讨杜老子学体系中的建构过程及其辩证思想，继承、发扬他的科学精神，这对于纪念杜老，促进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一、唯物辩证法在子学中的开拓

从春秋末至战国后期，正当我国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阶段。贤智并起，百家争鸣，因而文化空前繁荣。它一方面

总结了西周以来文化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为我国后来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作为这一时期思想精华的先秦哲学，更成为我国二千多年来各家各派哲学发展的基始和理论渊源。无论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至清代汉学或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思想，都或深或浅染上它的色彩。为了吸取历史遗产，发展自己的文化，两汉以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极其重视先秦诸子的研究。“五四”以来子学研究风气日浓，这更是新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必然表现。然而诸子典籍及其研究史料浩如烟海，不说中古以前，就是近代以来，关于先秦诸子的著述，也是名家林立。从一九〇六年章太炎的《论诸子学》、一九二二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一九三二年郭湛波著、胡适等校的《先秦辩学史》、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等的先后问世，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可是由于没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它们只能“部分地完成了原始资料的整理”，或“对某些流派作了历史考察”，但“对先秦名家学说的内部联系和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则“无力作出科学的阐释和论断”^①。因此，真正进行科学地考察，贯彻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研究，又是“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了。“五四”运动后，就是在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中，由于革命环境艰险，斗争任务的紧迫，能以中国思想史，特别以“子学”为对象进行探索者更是难能可贵，寥若晨星。在这一史学的异军突起中，屈指可数者除郭沫若、侯外庐二老外，对诸子哲学思想进行系统而辩证地考察的，则首推杜国庠老先生了。杜老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二十年代就从师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熏陶，翻译了《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史的一元论》、《金融资本论》等，逐步清除了王阳明“心学”迷雾的影响，

不断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深层开展了先秦诸子思想的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除与侯外庐合编《中国思想通史》外，先后发表了《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论公孙龙子》、《荀子从宋尹黄老学派接受了什么？》、《论荀子的“成相篇”》、《荀子对诸子的批判》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等几部巨著，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和现代文化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近现代歪曲和诬蔑诸子学说的思潮进行正本清源的科学清理。如“对实用主义者歪曲或诬蔑了的唯物主义者后期的墨家、荀子……”，对有些“唯心主义者假借的庄子、公孙龙……”和“复古主义者所曲解的周公、孔子……”等都认真进行了“破除谬说，予以历史主义的阐发。”这就从根本观点上澄清了对先秦诸子所造成的混乱和曲解，正确发扬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第二，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对过去被史学界重视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独到的见解，不断填补了史学领域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理论。如认为“墨家逻辑可以说是集先秦逻辑思想的大成，是中国古代一家比较完备的唯物主义的逻辑”^②，而作为墨家后期代表作的《墨经》，作了充分的评价，认为它对中国古代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贡献最大，“非儒、道、名、法诸家所能望者”。又如对公孙龙的重新评价，认为他的哲学是一种“多元的客观唯心主义”，被史学界尊为这是“难移的断案”。对荀子《成相篇》的评价，认为这是“对荀子哲学思想的总结。指出荀子虽继承了儒家的礼学，但对‘礼’作了新的解释，把礼的观念发展到几乎和法的概念一致的地步。”^③至于“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

者的一系列论断”，侯外老认为是“为中国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④这样，杜老就从正反两方面，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清理先秦诸子学说源流及其发展脉络，建立科学的子学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诸子各派“相訾”、“相应”的对立统一关系

奴隶制的解体封建制的兴起，促使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动和新旧关系的反复、转换，产生了复杂的社会思潮及其哲学思想的多元化。哲学的发展，不可能仅仅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而必然是诸家并起、众派纷争。因此如何探讨先秦诸子各派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此起彼伏、相互交替的兴衰过程，这就有一个方法论问题。但在三、四十年代的哲学界，由于苏联的影响，哲学史的研究正流行着一种把唯物唯心斗争绝对化的两分法。这种方法到了一九四七年苏联讨论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时，在日丹诺夫提的哲学史定义中更加突出和拔高了。他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就进一步把这种“两分法”变为僵化的传统模式，广泛流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但疾风知劲草，在杜老的子学研究中，并没有受到这种传统模式的左右，而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考察我国古代各派哲学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特点。他针对当时诸子并立，百家纷争的特点，摈弃非此即彼、非唯物即唯心的简单模式，提出必须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葛藤”思想方法，去考察“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斩不断的盘根错节的复杂关

系^⑤。因为当时每一家“都想以其学易天下”，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学派发生矛盾，对不同观点或是或非，或褒或贬，发生相互排斥和斗争。杜老在这里辩证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各派哲学关系，说明了斗争发展的特点和趋势。首先，揭示了先秦诸子在相互对立中的相互制约、相互分离中的彼此依存的矛盾关系。儒、墨本来是相互对立的先秦两显，在天道观、政治、伦理和名辩思想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可是他们又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因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只由于各有“取舍不同”而“分道扬镳，各自成家”。而且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而用夏政”^⑥。可见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是针对儒家的礼、乐一套而提出的，“用夏政”与“背周”是相互依存和相互牵制着的。其次，提出了诸子各派在相互排斥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和转化，在相互分化和独立中潜在着新的联系和统一。儒墨双方在天道观上既相互反动，又存在某些相通的地方。如孔子虽不言“性与天道”，怀疑鬼神，但又相信“天命”；墨子虽强调“非命”，但又讲“明鬼”和“天志”。因而双方都未摆脱人神信仰的传统信仰形式。正是由于这种相通性，所以它们的某些思想易于被后来稷下的宋钘、尹文批判、继承，并加以调和、揉合成为黄老初期的天道观。经过庄子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天道无为而自然的思想。因此，杜老对诸子各派哲学的斗争指出一种现象，就是各家“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的思想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在那过程中，批判者也受到了被批判者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使自己思想体系染上了对方的色调”^⑦，因而儒墨从初期相互诘难辩疑，进行了“相訾”“相应”的结果，既互相批判、又相互吸取，使先秦两显的天道观被初期道家

加以揉合，互相感染，对原来的天道观进行扬弃，向着较高形态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和认识论转化。一方面，荀卿站在儒家的立场，却“批判地接受了稷下初期黄老派宋钲、尹文的自然天道观，而建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而在名辩方面，也深受宋、尹的影响，“转变他们养心的思想为治心之术，使他的认识论深深染上唯物观和心理的色彩”^⑧。因而形成了后期儒家的“先秦最富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哲学”。另一方面，墨家中则经过宋、尹和庄子等批判继承而发展为以《墨经》为中心的后期墨学，克服了墨子的“天志”、“明鬼”等迷信成分，发展了唯物主义因素，在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作出较大的贡献。这就说明诸子各派哲学的发展，并非单向的唯物、唯心斗争的直线发展史，而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辩证法的与形而上学，科学与非科学的多侧面、多元性的相互斗争、相互批判、不断相互吸取和借鉴有益的因素，淘汰和摈弃落后因素，发展进步的、有生命的方面，共同促进整个社会哲学思想的提高。这是人类认识矛盾发展的辩证法。

三、诸子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 和逻辑学的三者同一

过去西方一些讲中国哲学史的人，常常有一种曲解和偏见。如“某些西方唯心主义者”认为“古代中国无哲学”^⑨，所以没有哲学，他们是按黑格尔说的哲学的产生是以思维自由为前提的，而认为中国古代由于专制没有思维的自由。甚至说中国象形文字不适于哲学思维。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无知。不了解在几千年前春秋战

国这种百家争鸣、各派哲学奇葩斗艳的盛况。更不了解那时既有伦理道德和人生观哲学，也有认识论和逻辑思维的理论探讨。杜老关于先秦诸子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系统开拓，是对这种无知和偏见的当头棒喝。

杜老在考察诸子哲学构成中，阐发了列宁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说明了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有一般的本体论思想，而且有丰富的认识论、逻辑学理论。杜老认为“在中国，有过古代的逻辑思想。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派不具有自己的逻辑思想”^⑩。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发生了变革，各种事物生起了质变的时候，名实的背离也就更加迅速扩大。而新兴的事物，也要求人们给以新名。于是名实的调整，也就作为社会生活的调整的一个重要部门而被提出来了”^⑪。于是，孔子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辩证名分。墨子则提出“取实以名”，道家（老子）则主张“无名”。从而儒、墨、道之间展开了名实关系的大辩论，逐步形成了“名辩”思潮，出现了一批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在这里，“名”是作为逻辑思维细胞的概念，是客观事物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主观观念。相对于主观概念而言的客观事物则是“实”。因此在名辩中就包含着人的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关系的认识论和逻辑思维的问题。这种古代东方哲学中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的突出表现首先就是先秦墨学。墨子就是针对孔子的正名，根据任何事情都“须有规矩准绳”的原则，主张“言必有三表”，提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把这三者作为“立言标准”，要求人的一切言行“必须以经验为根据并以事功作为检证”从而形成了“基本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思想。同时在《非攻》中，提出“类”和“故”的概念，这是在认识论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了思维形式。杜老在分析了“类”与“故”在逻辑思维中的作用和发展规律时，提出“由察类、知类、明类而达到明理，由明理而达到明故”。“理”就是事物发展的条理，亦即规律。事物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客观的逻辑，它反映在人的脑子里便形成主观的逻辑。所谓“故”，在物理方面说来，是事物生成的原因，而其本身又是其他事物发展的结果。因此“达到了故，便接触到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因果律。在逻辑方面说来，它又是立论者或者批驳的理由（也是证明上的根据）。反转来，明故对于察类也有积极的帮助，它们的相互关系是辩证的关系”^⑩。因此墨子由于“类”概念和辩证运用，便摆脱了单纯罗列事例，而向科学的类推发展，进而到达归纳逻辑。归纳逻辑所得的结论又成为演绎逻辑的大前提。这样，类概念的逻辑发展，就替演绎法和归纳法架上了互相转化的桥梁。这些都反映了墨子逻辑思想及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儒墨两显初期的“名辩”思想经过惠施、公孔龙、庄子和荀子发展，到了后期墨家的《墨经》即《经》上、下，《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杜老认为它“在先秦子书中，呈现着一种异彩。它的内容，几乎全属于科学和逻辑的范围；尤其是关于逻辑部分，可说是集名家大成”^⑪。这表现在墨家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之前，已对辩学的主要问题作了较系统的阐述：首先它提出了辩学的目的、任务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其次，揭示了取得正确认识的根据和原则，就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即一切知识都要以客观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和人们的经验为根据，因而逐步接近了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了。第三，说明了贯

彻上述认识任务、原则的方法，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这就是依据反映事物性质的“概念”，进行“判断”，然后加以分析、“推理”，把演绎法与归纳法结合起来的逻辑思维形式。第四，还提出了“辟”（譬喻）“侔”（相比）“援”（援例）“推”（类推）等的立辞方式和应防的过错，并认为事物现象有貌似而本质不同的，就是同也“有以同”的“类”，不会是“毕同毕异”，而言辞也“多方，殊类，异故”的，不能一概而论。

杜老剖析了先秦逻辑特点，说明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初期，是逻辑学与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一九三七年，杜老就写了《为什么逻辑学离不开认识论？》明确阐述了三者同一的原理。他指出“因为逻辑上的概念、范畴，乃至法则等，事实上无一不是人类认识过程所获得的结果之被定式化了的东西”。因此“没有对于实在世界的正确的认识，便没有方法建立起真正的逻辑”^⑭。而实在世界的运动发展规律，在未被人们认识前，它是客观辩证法，反映在人的头脑中便是主观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都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的认识过程及其思维形式的表现。因而列宁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⑮。这是列宁在1916年《哲学笔记》中提出的命题，是哲学发展史上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杜老在当时《哲学笔记》还未有全部中译本的条件下，掌握了这一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先秦哲学研究中来，这是一个极其新颖而珍贵的科学尝试。它把人们表面看来似乎孤立、割裂的哲学内容，重新恢复它本来的有机联系，这不仅澄清了过去西方学者的曲解，而且为更好地批判继承我国哲学遗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历史和逻辑统一子学体系的建构

通过先秦诸子各学派、各方面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理清了各派思想源流的内外关系和发展线索，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有自己特点的子学体系。这是杜老在先秦诸子研究中一个科学创建和巨大成果。

杜老通观全局，发现整个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象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与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因此他提出“知人论世”的原则，把一家、一派、一人的剖析与整个先秦社会及其哲学整体发展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从这些思想葛藤中找出它的来龙去脉，才能了解先秦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系统和发展规律。这一思想基本体现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中，它从纵横两个方面揭示诸子思想发展的整个体系及其结构层次。其系统的大概轮廓试简列如下表（见下页）：

这一简要表式，是一个粗线条扫描，不可能完全确切反映原著，甚至难免发生牵强和谬误。但“倾国宜通体，谁来独选眉”。只要我们从先秦哲学的整体看，根据《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有关方面的论述，我们就可总揽诸子哲学思潮发展的整个趋势，明确看到诸子思想两个层次的依次演进和人的认识发展进程，是符合西周以后两汉以前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人的思想逻辑不断上升的阶梯的，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理论体现。

可是在这一科学建构中，不能靠一般的史料叙述，而是对先秦思想化石的科学挖掘和理性的再选。在这里杜老创造性地解决